

王蒙传论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於可训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王蒙传论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於可训 著

Wuhan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传论/於可训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4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06876-6

I. 王… II. 於… III. ①王蒙—生平事迹 ②王蒙—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121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980 1/16 印张: 39 字数: 556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876-6/K · 406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命运的暗示	8
第二章 “少年布尔什维克”	29
第三章 “青春万岁”	48
第四章 “恋爱的季节”	69
第五章 “轩然大波”	84
第六章 “去新疆好不好”	105
第七章 “两间余一卒”	129
第八章 “逍遥游”（一）	147
第九章 “逍遥游”（二）	169
第十章 “再也不能等下去”	190
第十一章 “回到文学界”	210
第十二章 “布礼”（上）	229
第十三章 “布礼”（下）	249
第十四章 “蝴蝶”的寓言	268
第十五章 “风筝”的故事	288
第十六章 “真正的小说”	310

第十七章	“难忘难记”	330
第十八章	“世情书”	349
第十九章	“且将故事说浮生”	370
第二十章	“如诗的篇什”	389
第二十一章	“最痛苦的作品”	409
第二十二章	“来劲”	429
第二十三章	说不完的“稀粥”	448
第二十四章	“无心修饰的散文”	463
第二十五章	“其实是个诗人”	483
第二十六章	“学者化”	502
第二十七章	无尽的“季节”（上）	528
第二十八章	无尽的“季节”（中）	551
第二十九章	无尽的“季节”（下）	571
第三十章	王蒙的人生哲学	589
主要参考书目		611
后记		614

引 言

很多人说过，给一位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当代作家作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险的事。这道理不言而喻，自然是因为他（或她）的创作连同他（或她）个人的一切，包括他（或她）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都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着的事物很难料定，因此也就很难给传主下一个盖棺论定的断语。这也可能犯了传记类文字的大忌，因为一切记录历史的文字从来就是为过去的人、事预备的，当代的人、事是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的。

当然，问题也有另一方面。这正如争论了多少年的当代文学能否成“史”的问题，争论归争论，分歧归分歧，当代文学仍然在许多场合要以“史”的面目出现，而且论述当代文学“史”的论著，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日见提高。似乎就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怕冒这份风险。我想，这原因不是别的，实在是因为对当代文学作“史”的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诱惑。而且一切文学研究，也离不开“史”的基础。“史”、“传”本为一体之物，“史”的诱惑，捎带着也影响了传记写作，使当代作家传记也成了一个如法朗士所说的

灵魂“探险”的场所^①。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与过去时代的人、事对话的话，那么，这种对话的距离自然是越近越好。虽则近距离的对话因为置身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情境，难以保持适当的审视距离（似乎又犯了史家一忌），但毕竟看得真切，看得实际，可免雾里观花、水中望月之弊。这样，相对于与时空距离久远的古代人、事的对话而言，与当代人、事的对话，自然就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的研究因此也就不能拒绝当代人、事的诱惑，当代的人、事于是也就具备了进入历史的条件和依据。

为当代作家作传，无疑也存在着这种近距离的对话所造成的在场感的诱惑。这也许就是我当初决定写作这本《王蒙传论》的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能满足我的当代文学研究兴趣的理由吧。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当代作家对传记写作都存在着这种诱惑，亦即是都会唤起写作者与之对话的欲望和冲动，都会引发写作者为之作传的兴趣，都有为之作传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一部希望显示出某种特定历史价值的文学传记，它的理想对象，极有可能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作家，即他（或她）自身的创作既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特点，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同时又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某些共同性趋势，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某种独特性的标志。通过他（或她）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不但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趋势，同时也可以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和追求，因而，与他（或她）的对话，就不是与一个时代的个别作家的对话，而是与他（或她）置身其中的整个文学时代的对话。因为在他（或她）身后，有丹纳所说的他（或她）“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和“在它（按：指该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笔者）周围而趣味和他（或她）一致的

^① 法朗士说：文学批评是批评家的灵魂在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67页。

社会”^①。

根据这样的写作目的和选择标准，为当代作家作传，你不能不说，王蒙无疑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对象。

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1970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着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1950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19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1950年代中期兴

^① 参见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页。

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1950年代的王蒙,是以他对生活的善良愿望和善意批评,因为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而无意间冲击了某种业已形成的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信条的话,那么,在1970年代末复出以后,乃至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来,他对于长期以来被遵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和主导潮流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冲击,就是有意识的和逐渐自觉的。这种有意识的自觉性虽然是他个人对于生活和文学的深刻反思的结果,但同时也顺应了这期间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趋势。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到1980年代初革新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艺术实验,乃至此后在文学的体裁和样式,尤其是小说的文体、语言和叙述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新和实验,都是王蒙在这期间为更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推进文学变革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而且这些革新和实验又因其具有相当的先锋和前卫色彩,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实绩而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因而也就成了新时期新的文学革新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蒙所走过的这一条挑战和革新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和时代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虽然就其必然性来说,是时势使然,但就其现实性来说,却又取决于个体的条件。这其中就包括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生命史和生活史的内容,以及这个作家在他的全部生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接受的社会文化(包括文学)影响。就王蒙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人生历史和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文化和文学影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包括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而言,他走上文学道路,注定要与现实主义结缘,他的创作,注定属于主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范畴。但是,也正是“五四”新文学和苏联文学中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温情,使王蒙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主流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甚至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形成了一种挑战和冲击。虽然他因此而蒙受了长期的人生苦难,但复出后的创作

仍然没有偏离他所认定的这一现实主义的文学轨道。只不过在恢复和重建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因为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包括苏联文学中的西方传统和现代主义因素）的影响，而使早期对主流的现实主义的无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变成了对其中的某些僵化的教条的自觉的扬弃和“反叛”。但是，“反叛”后的王蒙又没有如这期间以反传统相号召的某些先锋和前卫作家那样，走上一条模拟西方的现代主义道路，而是使现实主义在容纳异质因素的同时，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自19世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经历了由原旨的现实主义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性（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批判旧的现实的同时，强调对新的现实的肯定性的发展变化，又在面对现代主义的冲击和克服自身的僵化的过程中，经历过1960年代主张容纳现代主义的“无边的现实主义”^①和1970年代主张适度开放的“开放的现实主义”^②的挑战，本来就充满了无穷恩怨和无尽沧桑，到了1980年代，又在以王蒙为代表的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完成了它在一个世纪内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的终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从1950年代在“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中强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到1980年代通过种种文学实验，革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方法，半个世纪以来，王蒙的

① 1960年代初，法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罗杰·加洛蒂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主张“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容纳卡夫卡、圣琼·佩斯和毕加索这样的一些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异质的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根据他们创作的“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曾在西方尤其是法国、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文学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② 1970年代初，苏联文艺理论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德·马尔科夫在他的长篇论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简称“开放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真实性原则、艺术表现手法和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以及对过去和现代各种体系、各种派别的艺术经验的融合方面，都应当是“开放的”，但前提是不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艺术的党性原则。

创作和文学活动，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的曲折行进的历史和现实主义经由内部变革和外部冲击日渐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鉴于王蒙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历史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和复杂联系，我把追寻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发展演变的规律性，进而通过这种追寻，透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曲折行进的历史轨迹，也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

而且，就王蒙从 1950 年代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到 1980 年代在保持这种影响的同时，又接受欧美文学的影响而言，这种变化本身也是极有意味的。接受前者的影响，对王蒙来说，无疑是同构同质的；接受后者的影响，则是异构异质的。但是，无论是同构同质的还是异构异质的，都是 20 世纪下半叶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碰撞，在王蒙的创作中所激起的思想和艺术回响。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碰撞，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所激起的剧烈振荡，甚至也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时尚的因素，影响到王蒙的创作，使他的创作也带有这期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复杂的文化色彩。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因为这些影响而染上的种种文化色彩，以及隐含于其中的复杂的现代性因素，同样也是我在写作本书时所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问题。

无论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还是作为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作家，王蒙都是 20 世纪下半叶激烈动荡、复杂微妙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因而时代和社会也就不能不在他身上打下许多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除了在政治和文学上对他的人生和事业造成直接影响外，也见之于他所特有的一种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质。王蒙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的作家。他的人生智慧不仅表现在应对日常生活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灵活和机敏，以及由这种灵活和机敏而生发出来的灵感动和幽默感，同时也表现在他凝聚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中西哲学的生存智慧所形成的独特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学智慧同样不仅表现于他的创作在文体、语言和手法、技巧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多变，同时也表现于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融合中外古今文学思想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学观念。这种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文学智慧，也使得王蒙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

学中，都变得异常的复杂和多面，是佛斯特所说的那种充满着多样的矛盾统一体的“圆形人物”，而不是单一的平面化的“扁平人物”^①。王蒙曾用一段戏谑性的文字归纳“评论者”对他所下的“互相矛盾的断语”：

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50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是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了西方的艺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是北京作家群的“哥们儿”。是新潮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一阔脸就变。是儒。是老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②

王蒙对这种“互相矛盾的断语”是十分“得意”的。这虽然不是他的真实写照，但也表明，要描画出一个相对真实的王蒙，谈何容易！“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我的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③于是，我记起了作家陈村关于为王蒙作传所说的一段话：“假如日后我改行写传记，很愿写写王蒙。他对写传的人无疑是个圈套，还是个诱惑。”^④

我所面对的，正是这个“圈套”和“诱惑”。

① 参见佛斯特：《小说面面观》第四章《人物（下）》，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王蒙：《“蝴蝶”为什么得意》，《人民文学》1989年第5期。

③ 王蒙：《“蝴蝶”为什么得意》，《人民文学》1989年第5期。

④ 转引自程德培：《33位小说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第一章

命运的暗示

中国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年轻化。如果说古典式的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也有过“英雄出少年”的时候的话，那大半是凭借早熟的膂力和非凡的武功，在思想和组织上，是很难凭借一个少年的智识和能力号令天下、领袖群伦的。那倒不是因为在这些少年英雄中，就没有思想和智力的早熟者，而是因为“革命者”的年龄，对于那样的一种以四时更替、天道轮回为哲学依据的“革命”来说，并无特别的作用和意义，故而在这样的“革命”队伍中，即使有少年英雄出现，除了个别被周围的成人“拥立为王”者外，也不会真正成为“天命攸归”的对象。这样，某些少年英雄在这种古典式的“革命”中，留给历史的，就只能是传奇作家口头或笔下的谈资，“革命”终究是那些老谋深算、能征惯战的成年人的事业。

到了近代中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不知道欧西各国“革命”一词演变的具体情形如何，至少在中国，“革命”这个由老祖

宗创造的词汇，后来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①。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与从西方传进来的进化论思想的结合。进化是一种规律，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但是，进化是需要一种力量来推动的。这力量，在自然界，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则是一切形式的渐进的或激进的改良和革命。“革命”与进化论思想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所固有的四时更替、天道轮回的观念，转而成成了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杠杆和动力。

既然“革命”不再是权力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周而复始的循环和更替，而是要把历史引向未来的方向，新的革命也就不能不依靠一种新的力量冲破旧的桎梏，不能不寻找一种新的萌芽以摒弃旧的躯壳，也不能不寄托于一种新的生命以达于未来的理想。而符合新的革命所需要的这一切新的元素，无论是就生命的个体还是就一种社会群体来说，无疑都集中地体现在少年这一社会人群及其个体身上。“革命”的词义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为少年这一社会人群及其个体进入革命历史，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和依据，于是，从近代以来，一批一批的少年^②英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现代革命的历史主体。不管这些少年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也不管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是以何种形式参加革命的，以及他们在革命的历史中，处于何种实际的位置，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现代中国革命“天命攸归”的对象。

王蒙在1940年代末的历史转折期成为“少年布尔什维克”，无疑也是这种“天命”选择的结果。

二

对革命历史的这种选择，作为当事人的王蒙，显然是没有自觉

① 对这种变化的详细“考论”，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少年”的年龄界限从近代到“五四”前后，一直比较模糊，在许多情况下，也包括今天所说的“青年”。

意识的。

1934年10月15日，当王蒙在故都北平出生的时候，他后来颇感浪漫的革命，却在经历了五次残酷的“围剿”之后，刚刚突出重围，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王蒙自称是出生在北平沙滩的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时，他的父母都在北平上学。他的名字还是他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的同室舍友、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学者的何其芳起的。何当时喜读《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于是就把这“阿蒙”二字移用在他的同学新得的贵子身上了，后来因为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他姐姐王洒的名字，则是他父亲的另一个同室舍友、后来也成了著名文学家的李长之起的。典出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洒（萨）》。

如果按出生地算，王蒙是地道的北京（北平）人，但他的祖籍却是河北沧州的南皮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南皮县沧州市（原地区）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①可见王蒙对家乡的感情的复杂多义。

沧州近海，古属边鄙贫瘠之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王蒙成人后第一次回到故乡，所见还是白花花的一片碱地。当地有一首流行的民谣，后来被王蒙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颇能说明其贫困、愚昧和落后的状况：

羊巴巴蛋，

^①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上脚搓，
俺是你兄弟，
你是俺哥。
打壶酒，
咱俩喝。
喝醉了，
打老婆。
打死（读 sa）老婆怎么过？
有钱的（读 di），
再说个。
没（读 mu）钱的，
背上鼓子唱秧歌。

但沧州古来又是尚武之地，在民间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因为《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不少人都曾发配沧州，所以，说沧州是个出英雄好汉的地方，也不为错。最近的一个证明，就是在清末闹义和团的时候，还是拳民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也正应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古话，只不过这句话日后应在王蒙身上，却是他“慷慨”西行 16 年的“自我发配”。有趣的是，在这“自我发配”的途中，偏偏在万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又历史地遭遇了当年同他一样倒霉的大同乡（据说与他的母系还沾着一点亲戚关系）——河北献县的纪昀大学士。纪昀当年风头正健却因“漏言”获罪，被滴戍乌鲁木齐，在新疆当了近三年的“贬官”。但因为他待人宽和、性情坦率、学识渊博、幽默风趣而与当地的官绅士子过从甚密，想来也没吃太大太多的苦头，所以，他在新疆流放的那几年，除完成他职责内的“佐军务”，干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工作外，还可以游山玩水、建言议事、交朋结友、勘测地舆、考究民情等等，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身心也是比较舒畅的。这虽然与王蒙在新疆 16 年的遭遇不尽相同，但心境毕竟也有许多近似之处。纪昀“遇赦赐还”后官运亨通，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期间，还干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就是受命参与编纂《四库全书》，任《四库全

书》总纂官。晚年整理、追述旧闻，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传世。后人为纪念纪昀在乌鲁木齐的那一段“贬官”生涯，于该市的鉴湖泽畔筑有一排平房，取纪昀在京都的旧居名曰“阅微草堂”。我不知道王蒙在新疆期间是否去拜谒过这座阅微草堂，面对与自己的性格、命运乃至具体的人生经历都极为近似的这位乡先贤，不知作何感想。

如果说纪昀的人生和命运，对王蒙来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和预警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位乡先贤张之洞的功业和思想，对王蒙来说，就有一种潜隐无形的启示和规约作用。这位祖籍南皮、在清末名重一时的洋务派大臣，不但通过兴办实业、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把他的“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而且还以一部《劝学篇》，系统地概括了整个“洋务派”的思想，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文明挑战的思想利器，也是近代中国协调中西文化冲突，追寻现代化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路。王蒙生活的时代，当然与张之洞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西方文明的挑战依旧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尚未结束，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致力于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处在这样一个性质不同但结构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无论王蒙自己是否有明确而清醒的意识，他此后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似乎仍未走出他的同乡在一百多年前所“规划”的这一逻辑理路。只不过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已不复是旧日的格局。对王蒙来说，今天的“中学”，自然不是古老的儒家经典，而是现代的知识系统。具体而言，在哲学和思想文化方面，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学方面，则是“五四”以后所形成的新的现代文学传统。今天的“西学”，也不完全是当年的格致、算学和声、光、电、化等各科技艺，而是形形色色的现代科技、现代哲学乃至文学艺术的观念和方法。王蒙在这两者之间折冲中、西，以前者为“体”，以后者为“用”，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冲突中，建构了一种新的“体”、“用”关系。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冥冥之中的“定数”呢？

在张之洞一代的“洋务运动”失败后，王蒙的祖父王章峰，